

文艺作品选

第七輯



革命斗争回忆录

飘动的篝火

朱家胜等著

作家出版社

內容說明

本書包括七篇短小精悍的革命斗争回忆录。这些作品都生动地反映了红军长征时期艰苦斗争的一个侧面，写出了革命前进中的一个脚印。不论是写对敌斗争的“巧取陈家寨”、“钢枪队”，或回忆过草地艰苦生活的“飘动的篝火”、“咱们的王政委”等篇，都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，表现了我军的优良传统。本书并附有林默涵、茅盾、杜鹏程等同志对这些文章的评介，对读者了解作品有很大帮助。

飘动的篝火

朱家胜等著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

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

*

字数38,000 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$2\frac{1}{16}$ 插页2

195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1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20·1422

定 价：(1)0.13 元

目 次

潘虎.....	邓 洪(1)
鋼枪队.....	傅紹堂(12)
我跟父亲当紅軍.....	吳华夺(18)
飘动的篝火.....	朱家胜(24)
咱班的“王政委”.....	赵連成(30)
在鷓落坪的深林里.....	罗映臣(36)
釣魚.....	邱 卓(43)
巧取陈家寨.....	胡世香(46)
革命史詩的篇章.....	林默涵(55)
《潘虎》等三篇作品讀后感.....	茅 盾(59)
英雄的抒情詩.....	杜鵬程(62)

潘 虎

邓 洪

1930年6月，我以修鐘表为掩护，在瀏陽县的鎮头市从事党的秘密活动。这时，湘东北各地到处有党的地下組織，到处有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，有些地方的羣众还自动組織起来暴动，革命的浪濤正在湘东北地区汹涌澎湃地發展着。駐在鎮头市的反动地方团队查获我們准备暴动的兩布袋紅色袖章，認為我有嫌疑，把我逮捕了。幸喜沒有被抓到什么証据，又找到有力的保人，我才得从虎口中逃脫出来。

但由此一来，我就不能在鎮头市呆下去了，因此决定到醴陵县去。鎮头市离醴陵90里，我找了一个叫李春生的人一道去，他是我職業上的同伴，不是革命同志。我們都穿着雪白的竹布褂褲，撑着漂亮的布傘，提着小小的修鐘表的工具箱，这是作为鐘表匠所需要的裝束。

我們一大早出發，出鎮不远，就有一个农民跟在我們后面同行，背上背一个布袋，看样子是从鎮头市买东西回乡下去的。这人一直跟着我們，我們坐下休息，他也休息，我們走，他也走。

半上午，到了一个名叫石灰嘴的地方。这是一个小集鎮，只有十多戶店鋪，我們坐下休息时，那个买东西的农民却沒有照例跟着坐下来。一会，另外来了兩個农民，問我們叫什么名

字，做什事情，从哪里来，最后用邀請的口气說：

“我們隊長請你們去談談。”

不多久以前，听說石灰嘴搞起了一个紅軍游击队，但我沒有和他們發生过直接联系。当时湘东北党組織为了便于不相識的同志之間必要时的相互联系，規定得有一些聯絡暗号和暗語。我想，既然是紅軍游击队，憑暗号暗語一定可以溝通关系。于是大胆同那兩個农民去見隊長。李春生却害怕起来，兩眼張皇地望着我，臉色鉄青。

走到一間屋子門口，有一个手持梭鏢的农民站崗，胳膊上挂了一个紅袖章，他望望我和李春生，又向那兩個喊我們来的农民眨眨眼睛。再往里走，厅堂里很肅靜，只有一个彪形大汉昂头挺胸坐在一張椅子上。那大汉粗眉毛，大眼睛，滿腮胡子，黑里透紅的臉色，穿一身青布的普通对襟短裝，一見我們就指着喝道：

“你你你你們是什、什么人？”

他口吃，說起話来急的眼睛一个勁地眨动。

我把我們的姓名，籍貫，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做什么事情，說了一遍。这当中，有几个人陆陸續續从屋子后面走了出来，也都是穿着老百姓衣服。

“你你你們是是是探、探子。”那大汉又指着我喝道。

所謂探子，就是偵探，憑什么說我們是偵探呢？我有些奇怪。莫不是我們这身裝束招惹注意么？我从从容容地回答他：

“报告隊長，我們是修鐘表的，不是探子。”

“你还还还强辯，我我我們昨天卜、卜、卜了卦，說今、今天有兩個探探探子来。”說罢轉向旁边的人喝道：“綁綁綁起来！”

看見他們真的要綁，我就一面申說，一面用手勢做暗号。我張开五指把手一舉，他們沒有反应；我又把衣領向里一折，他們也沒有反应；再用食指和拇指做成半个圓圈，還是沒有反应。于是我就用暗語問他們：“五大洲”是什麼，他們答不出；又問“四大將領”是誰，他們也不懂。我心里慌了，這是什麼游击队呢？

在我爭辯着，做着手勢的當中，他們已經把我們綁起來了。大概由於老是我一個人講話，李春生沒有做聲，他們又把我一個人吊了起來，用大竹片敲打我，要我招認是哪里派出的偵探；正是大熱天，汗從頭上淌下來，匯集到下巴尖上，象流水一樣往下落。李春生被綁着兩手站在一旁，只是哀哀地哭泣：“不得了呀！我家里還有娘呀！還有老婆孩子呀！”

我火了，仗着自己有組織關係，態度也就很強硬。我厲聲問他們：

“你們到底是什麼游击队！受那里領導的？”

“我我我我們是紅、紅軍游击队，我我我我自己領、領導的。”那蠻橫的隊長暴跳着說。

“你們既然是紅軍游击队，為什麼我剛才作許多聯絡暗号，你們不懂呢？告訴你們，我倒真是個共產黨員哩。”

“你你你你还強、強辯！”那隊長大發雷霆，拿起一把磨得雪亮的劍刀往我腳下一丟：“請請請你直架。”

這是句江湖黑話，意思就是“殺你的頭”。我不由一驚，但馬上就鎮靜下來，依然態度強硬地說：

“我的頭是不容易殺的，我是有組織的。你們要殺，也要等過三天，先派人到上級去查問清楚。”那隊長還要咆哮，旁邊

有人插进来問我：

“你在这地方認識什么人么？”

我立刻想起有个叫潘紹桃的鐘表匠来，他的徒弟是我学修鐘表的師傅，我便說出了他的名字。

这一来，他們就停止了拷打，互相挤了一下眼睛，那位隊長就走出去了，其余的人也一个一个跟着出去了，屋里只剩下我和李春生两个。汗在臉上流着，好象很多虫子在臉上爬着咬着似的，全身衣服都湿透；脚底地上汗水成了洼。我看看李春生，他似乎比我吊着的还难受，臉上沒有一点人色。

过了一会，有几个人端着三个瓜瓢和飯甌碗筷之类来了。一个瓜瓢里盛着一只鷄，一个瓢里盛着一条魚，另一个盛着一个猪肘子。他們把我放下来，把李春生的手也解开了，叫我們吃飯。李春生还在哭泣，一点也不吃，我倒吃了个滿飽。吃过飯后，又給綁起了，但沒吊上。

忽然外面有人吆喝，只見一个农民推着一輛独輪車走来，車子上堆着几个飽鼓鼓的袋子，車子后面跟着好些人。車子一停，有的人就搬起袋子往籬筐里倒，原来是裝的白米；另一些人却把那推車子的人按倒在地，用竹片鞭打他。那竹片是经过削制的，看得出是特备的刑具。

那推車子的人一面掙扎，一面嚎叫：

“副爷！不要打我呀！我不是土豪呀！我是他家里的長工呀！”

“誰叫你給土豪家做長工？”

“哪个叫你給土豪推車子？”

人們嘈杂地喝罵着。

那人又哀求說，他家里沒田，不做長工就沒飯吃。又說，土豪家里沒有人推得起車子，他要不給推，這米就到不了游擊隊。

可是人們不由分說，畢竟狠狠地打了他一頓，还用馬刀把所有的布袋都砍破了，把車子也劈掉了。

看到這種情況，叫我哭不得笑不得。怎麼他們是這麼一種作風呢？而我，碰上這樣一些蠻不講理的人，又怎麼對付他們呢？這時我才真的納悶起來。

一會，來了一個人，他說他姓唐，叫唐福仁，堆着滿臉笑容向我道歉：

“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我們誤會了，害你們受了委屈。”

說着把我們手上的繩子解掉了。

我把我的情況告訴他，要求派人到瀏陽第十六區（中場）去了解，他滿口答應。談了一會，他走了，還是把我們留在原來的房間。

又過了一會，潘紹桃來了。有了熟人該好說話了吧，我想。於是又把我的情況談了一陣，再度要求游擊隊派人了解。

“不要怕，”潘紹桃寬慰我說，“這是個誤會，不會把你們怎樣的。”他說他也在游擊隊里，他會幫助我把事情弄好的。

“你們隊長姓什麼？”我問他。

“姓潘，叫潘虎。”

“這人脾氣有點急躁吧？”我又試探着問。

潘紹桃笑笑，輕輕地點了點頭：

“是呀，就是有點脾氣，人家背地里都叫他潘蠻子哩。”大概他覺得不該說這話，馬上改變莊重的口氣說：“不過，人可真

是好人！又公道，又爽直，胆量又大，說干就干，队里的人也好，老百姓也好，沒誰个不敬重他的。”停一停又說：“他要不是这点脾气呀，說不准早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上大官哩。”

“他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呆过？”

“嗯，呆过不少年头哩。”

原来这潘虎以前在国民党的部队里由行伍出身升到連長，作战非常勇敢，北伐时立过很多功。蔣介石叛变革命时，他分不清是非，还是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連長。后来看見国民党的部队尽做些摧殘老百姓的事，他就气愤不过，开了小差。

“他是个文王（文盲）。”潘紹桃繼續說，“家里又穷，从部队里一回来，他就自己种田。今年四月，紅軍攻長沙时，他参加游击队当了一名兵。荆坪（屬瀏陽南乡）一仗，給敌人打散了，他就回来搞这个游击队，真正張旗鳴鼓搞起来还不到一个月哩。”

潘紹桃还告訴我，他們昨天真的卜了卦。那卜卦的人說，三天之內会有兩個探子从鎮头市那边来，潘隊長就馬上派人到鎮头市去偵察，就是那个背着一个布袋、跟在我們后面走了老半天的人。

与潘紹桃談过之后，我就放心了，我想，中坳离这里只有几十里，他們一定会派人去了解，也許已經派人了解去了。等那去了解的人一回来，我們不就可以脫身走了么？可沒料到，到了太陽下山的时候又把我們綁起了！还牽着繩子要我們出去！为什么还要綁我們呢？这傍晚时分把我們牽到什么地方去呢？这些連送米的長工都要狠狠地打一頓的蛮汉，能保不胡乱杀人么？我心里不由得緊張起来。

走出屋外，只見坪子里站着一支双行队伍，約有一百多人，有的肩着梭镖，有的肩着鳥銃，也有拿馬刀、鉄尺之类武器的，但沒有一支步枪；衣服也穿的五顏六色，只是胳膊上都有一个紅色的袖章。那位潘虎隊長走到队伍前面講話，結結巴巴地不知道講些什么，似乎是叫大家守規矩，粗声重气地沒說上兩三句話就結束道：“沒沒沒什么講的了。”

我也說不清当时是什么动机，忽然想出去講几句话，也許是对于他們那种作法所怀的不滿逼着我这样做吧。

“报告隊長！我可以向大家講几句话么？”

潘虎望望我，賭气似地說：

“你你你講吧。”

于是我向队伍前面走去。那个用繩子牽着我的人，倒象是被我牽着似的。

“同志們！我有几句话講。”我大声开始了我的講話。

全場頓時啞靜下来，一双双的眼睛都向我睜大着，这时我只想趁这个不可再得的机会，把我所知道的革命道理傾倒出来，而首先想到的是紅軍三大紀律。一直講了約莫个把鐘头，听的人連一点咳嗽的声音都沒有。

我把話講完之后，已經暮色沉沉了，队伍却向街外开去，我們两个也被牽着跟在后面。起初，由于剛才講話所产生的那种兴奋还在支配着我，我沒有完全想到当前的危險，等到走出街外，队伍不向大路走而折向通往山上的一条小道时，我立刻回复了緊張情緒。山道又陡又狹，兩旁的树木把黄昏时微弱的余光又遮去了一半，陰森森中只听得一百多人的脚步声唰唰唰作响，不由人毛髮都豎了起来。我想，我剛从敌

人的虎口里逃出来，要是又給游击队杀了的話，那才真是“冤哉枉也”哩。

翻过山頂来到一个山窩，这里有一小片比較平坦的地方，队伍忽然停住了。潘虎向我面前一站，粗声地問：

“你你你还有什么話、話講嗎？”

我以为是問我临刑的遺言，汗象黄豆般大一顆顆地冒出来，我說：

“別的話沒有，你把我杀了可不要說我是反革命。還有，請通知我父亲，請他来一下，你們不要打他，他是老实人。我身上还有十几塊錢，請你交給我父亲。”

沒有回答，也沒有解釋，队伍又在走动。走到一个很小的破屋子面前停下了。潘虎又对大家講話，他要大家早些睡覺，晚上要肅靜，还問派了哪些人放哨……

原来他們是来山上住宿，而不是杀我們的，我心里一塊石头这才落了地。我推想，他們是由于武力薄弱，晚上怕被敌人包圍，不敢停在鎮上，所以到山上来住。但他們为什么一定要用繩子牽着我們走呢？为什么不把上山住宿这事告訴我們而要使我們受這場虛惊呢？他們不是已經承認抓我們是出于誤会、还向我們道过歉么？碰到这些人真是莫可奈何！我在心里嘆了一口長气。

我們被指定在一个房子里睡覺，手上的繩子給解掉了，但橫擋着門口支起了一个临时的床鋪，有兩個人睡在上面看守着我們。

大概到了半夜时分，他們来問我的口供，桌子上点着一盞桐油灯，潘虎和別的五、六个人圍在房間里面坐着。

起初他們問我個人的情況，后来又問到有關革命形勢的一些問題和鎮頭市敵駐軍的動靜。開始時用的是審訊的口吻，慢慢就變成研究、商討式的談話了。潘虎一直很少做聲，談了好一會之後，他忽然向我命令道：

“你你你就在我們這這這里搞事吧！”

看見我沒有明白他的意思，又補充道：

“你不不不要走，就就就在我們這這這里搞事。”

原來他是要我參加他們的游擊隊。

“那不能啦，隊長。”我說，“我是有工作的，組織上分配了我的工作。”

“那你就就是探子！”潘虎把手向我一指，厲聲說。其余的人也跟着威逼我。

沒有辦法，我只好另找理由拒絕他們。

“你們这里的事我搞不來，你們不是革命，是胡鬧。”

話一出口，我自己吃了一驚，以為一定會激怒這位暴躁的隊長的。可是他卻沒有生氣，只是詫異地問：

“怎怎怎麼是胡鬧呢？”

于是我从毆打送米的長工這件事上指出他們許多錯誤，說明了黨的政策，告訴他們以後應該怎麼辦。

潘虎睜着那雙大眼睛，靜靜地听着。其余的人就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好象在說：“原來是這樣的呀！”

我的話一停，潘虎就馬上接着說：

“就就就照你你你說的辦。你你你來當政委。”

“我當政委？”

“嗯。”

我連忙搖頭：

“不行，不行，我沒有這分能力。”

“你你你是黨黨員嘛。”出乎意外，他的聲音突然變得很婉和，似乎已在向我低聲下氣了。

“你們要政委，”我說，“為什麼不要求組織上派一個下來呢？”

潘虎顯得有些尷尬：

“我我我是自、自己豎竿子的。”

我這才知道，原來他們不是我們黨領導的游擊隊，而是自發地組織起來的。

“怪不得，你們還信迷信，還卜卦。”

“卜卦怎怎怎麼不可以呢？孔孔孔明，劉劉劉伯溫也卜卜卜卦哩。”

我不覺好笑起來，我說：

“要我當政委的話，那你就得服從我啦。”

“我服服服從你。”潘虎誠懇地表示。

從被他們抓住起，我一直惱恨這個隊長，因為他蠻不講理地折磨了我大半天。可是這時我却忽然覺得他可愛起來。我想，象潘虎這樣的人，以及依附在他周圍的那些人，都是革命的基本羣眾，都是應該爭取的，而我既然碰上了他們，就更有責任把他們爭取到黨的旗幟下面來，何況他們還自動要求黨的領導，於是我说：

“好吧，我就留下。”

隨着我的話聲的停落，我第一次看見這位粗眉大眼的隊長象個孩子似的得意地笑了。

第二天，我們就和黨組織取得了聯繫，潘虎的游擊隊由瀏陽縣第十六區領導，潘虎任隊長，我任政委。當年七月，為了配合紅軍第二次進攻長沙，十六區把全區的游擊隊合併起來，改編為赤衛隊第十六團，我任團軍需長，潘虎任副團長兼特務連連長。這特務連是全團的一個核心，全團只有二十支步槍，全部編在特務連里，這是因為十六區當時只有潘虎一個人懂得一些軍事。十月，瀏陽的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四個區的赤衛隊又合編為赤衛第五師，又把全師的槍支集中在特務連里，由潘虎掌握，我就改任師政委。潘虎對黨非常忠誠，執行黨的任务非常堅決；黨對他也特別加以培養，在他正式參加革命之後不久，就由我介紹，把他吸收入黨了。這年冬，潘虎護送新兵到湘東南去充實紅軍主力，在江西萍鄉的蘆溪和宣風之間遇上敵人，他奮勇迎擊，不幸陣亡。當他犧牲的消息傳到十六區區委會時，區委會的同志沒有一個不痛哭失聲的。

鋼 枪 队

傅紹堂

1929年，皖西农民在秋天举行了暴动，成立了革命武装。

那年我正好十八岁，是一个刚满了师的织布工人。暴动后，我参加了在我家乡麒麟湾成立的红军游击大队。当时，这支游击队的武器只有一些大刀、矛子和几支土铳枪，至于钢枪是没有的。因此，搞枪就成了我们最迫切的任务。到哪里去搞呢？当然，只有在民团身上打主意。

离我们只有三十来里路的金岩，住着汪东阁的一个民团。可是他们究竟有多少人，多少枪，住在那个屋里，一点也不清楚。

有一天，队长桂伯炎把我叫了去，说道：“喂，小黑皮（因为我人矮又黑，所以大家给我起了这个浑号），听说你对金岩镇很熟悉，是吗？”我忙说：“那当然，闭了眼睛也能把它摸透！”我倒不是吹牛，金岩镇上有家项亨源盐店，我经常去贩盐。哪条街我没逛过！

桂队长瞅了我一眼，又问：“那么你敢当探子不？”

“为什么不敢？当然敢！”我当时血气方盛，瞧队长的神色，大有瞧不起我的模样，就粗着脖子把任务应了下来。说句良心话，我当游击队还不满十天，探子该怎么个当法，半点门也不摸。

“好，有种！”隊長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，把大拇指豎在我的鼻子前，說：“明天，你一个人到鎮上去，探一探民團住在什麼地方，有多少人，多少槍。”

第二天，我扛了一支大毛竹，裝着賣竹子，來到金岩鎮。

金岩鎮的城門，我不知走過多少次，可從沒有象這回一進門，心就蹦蹦地跳，迎面走來的民團，我總覺得他們老在注意我。

我胆顫心惊地走了一段路，肩膀有點發酸，想把毛竹換到左肩上。哪知道，毛竹還沒落到左肩膀，只听得身後“啪”的一聲，好象什麼玩意跌破了。我回頭一看，只見一個民團抓住我的竹子，吹鬍子瞪眼地冲着我罵：“小雜種，眼睛啦？酒壺，賠我酒壺！”原來我在換肩的時候，竹梢碰着他手裡的酒壺，酒壺掉在地上，碎了。我當時心裡一急，可怎麼也沉不住氣了，扔下毛竹，拔腿就往城外逃。

我第一次當探子，就這麼失敗了。

回到隊里，又氣又恨，心想这下可沒臉見人啦！怎麼辦呢？

我正想哭它一場，桂隊長來了，他給了我一快鋼洋，笑笑道：“不要害臊，第一次嘛，難免的。喏，拿着這個，明天再進城去，挑担鹽，敢不敢？”

我又驚又喜地接過鋼洋，心裡有說不盡的感激。那天夜晚好像比冬至夜還要長，我翻來復去的睡不着，只盼天快亮。

好不容易天亮了，我一口气奔進金岩鎮，在項亨源鹽店买了二十斤鹽，分作兩堆，裝在一付竹担筐里。我挑着鹽担滿街串，走到下碼頭附近，忽听得一陣哨子聲，接着在對面湖北會

館的大門里，奔出一羣民團來。好哇，原來這狗養的住在这里。

我心里虽然有一点慌，可是比昨天好了些，我下决心要看个究竟，于是放下鹽挑子，俯下身子裝作扎草鞋底，眼角却牢牢地瞅住他們。門里一家伙跑出一大幫人，唔，他們站隊了，看樣子是要出發。

不多會，隊伍走來了，狗日的走過一個，我心里數一個數，又要數人數還要數槍數，而數槍的時候，還要記着長的多少，短的多少。數着數着，給數亂了。人數只能估計二百帶點零，槍么，有一百四十二支長家伙，三支短的，還有四支不長不短的，看樣子是連發的。可是他們要到那里去呢？我挑起鹽挑趕到前面一個三岔路口，等他們來。

隊伍的最后面，是幾個挑鍋担柴的火頭兵，其中一個走到我的身邊，放下鍋担，一把抓住我說：“走，給我挑！”我給你挑？做夢去吧！——我心里這麼想，可嘴上却說：“我挑不動啊！”還裝出一付苦相。

這小子還是不放手，想吓唬我，喝道：“給我挑！小雜種，再羅嗦，老子揍死你！”

我身上有這麼重要的任務，怎麼能跟他走呢？“我挑不動，你揍死我我也挑不動！”我說着，便想掙脫他。

“路不遠，就在陳家沖龔家祠堂，四十里路。”那小子看硬的不行，就想用軟的。我想，你小爺不怕硬，還吃你軟的嗎？這下子我得知了他們實實在在的去向，更不能去了。

啪！啪！——那民團照准我臉上就是兩巴掌：“你小子，敬酒不吃想吃罰酒？給我挑！”